

“四人帮”反动哲学批判

曾钊新 张桂岳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四人帮”反动哲学批判

曾 钊 新 张 桂 岳

湖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长沙



“四人帮”反动哲学批判

曾钊新 张桂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印张：2.75

统一书号：3109·468 定价：0.17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帮权力意志徒.....	(8)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反动立场.....	(22)
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恶性发作.....	(35)
形而上学最猖獗的表演.....	(51)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猖狂进攻.....	(65)
揭穿“反经验主义为纲”的反革命实质.....	(77)

前 言

“四人帮”集中外反动派反动本性之大成，炮制了一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拾古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之余唾，拼凑了一条反动的哲学路线。“四人帮”的反动哲学路线是他们制订和推行反动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为了彻底揭露‘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必须深入批判他们那条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战胜他们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说明，从哲学高度批判“四人帮”和清算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条错误路线，仅仅从组织上、政治上解决问题，是不够的，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才能巩固斗争的成果。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军事上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紧接着，毛主席于一九三七年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对我党成立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从哲学上作出科学总结。嗣后，毛主席又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亲自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理论、路线、

世界观、方法论和作风（包括党风、学风和文风）等方面继续清算王明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这不仅促进了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统一和团结，而且形成了思想路线上的统一，为“七大”的召开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哲学路线，其欺骗性、危害性，远远超过了王明路线。因此，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决不能认为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此结束，而是必须从理论上开展对“四人帮”的深入的批判。对于“四人帮”的反动哲学，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是办不到的，也是不能奏效的。至于“四人帮”那条反动路线在人们世界观上的流毒和影响的肃清，情形更是如此。“四人帮”全面颠倒了物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种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颠倒，必然导致政治上以及一切方面的颠倒和混乱。比如，敌我关系的颠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颠倒，以及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红与专之间关系等方面所造成的颠倒和混乱，都是触目惊心、前所未有的。而所有这些颠倒和混乱，都是以哲学基本问题的颠倒为其理论基础。因此，对于“四人帮”在哲学上的颠倒和制造的混乱，不拨乱反正，不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那么，在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一切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方面，就不可能彻底纠正过来。有的同志，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没有肃清，对于我们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对于我们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所采取的措施不理解；有的同志在日常工作中不

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地办事情，发议论，或是盲目地表面地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而实际上妨碍上级指示的执行。这些问题，从哲学上分析，都是在物质与精神、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背离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

“四人帮”的哲学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唯心论、形而上学者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时必须看到，“四人帮”的反动哲学又有其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极右的实质和极“左”的形式混合在一起。他们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名，反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鼓吹“精神万能论”，随心所欲地捏造事实，臆造规律。他们打着“反经验主义为纲”的破旗，否定实践经验，同时又否认一切理性知识，鼓吹蒙昧主义。他们宣扬理论决定一切，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旗号，鼓吹斗争就是一切，“斗争就是政策”，煽动“对着干”，恶意歪曲和篡改辩证法。他们以上层建筑反作用为幌子，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反所谓“唯生产力论”，如此等等。都是以极“左”的面孔出现，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黑货，从而达到极右的反革命目的。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两面派阴谋时指出：他们一伙是“比马基恩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语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40页）。看来“四人帮”同托洛茨基之流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托洛茨基同“四

人帮”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在极右的实质方面，“四人帮”大大超过了托洛茨基；在极“左”的伪装方面，“四人帮”也大大地超过托洛茨基。“四人帮”的这个手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对于这种危险性认识不足，估计不足，有的甚至上了当受了骗而不知其上当受骗，犯了错误而不知其为错误。这是需要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提高认识的。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都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右，又反“左”，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决定我们的战略、策略和主攻目标。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从右的方面向马克思主义杀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右，同时防止“左”的倾向；当修正主义以“左”的、极“左”的面貌出现，来糟蹋马克思主义，对革命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左”，批“左”，揭露“左”的假面具，同时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前面我们已经作了剖析，“四人帮”的哲学路线和他们的政治路线一样，极右的实质表现为极“左”的形式。“四人帮”的“左”，不是一般的“左”倾，而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所需要的假面具的“左”。所以，我们在批判“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时候，要剥去其极“左”的外衣，还其极右的实质。

“四人帮”的反动哲学，由于它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国内，正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代。这样的历史条件，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国内，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因此，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哲学，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作为阶级的哲学而存在，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四人帮”的哲学既具有帝国主义法西斯的特征，又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特征，还具有社会主义时期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四人帮”反动哲学的阶级根源。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痛斥“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英明领袖华主席也一再斥责“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罪行。毛主席和华主席深刻揭露了“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四人帮”既是唯心主义者，又是形而上学者；他们不是一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者，而是“横行”、“猖獗”。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贯穿于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自始至终和一切方面，具有极端的反动性和疯狂性。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对于“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批判，必须抓住其极右的实质，极“左”的伪装，剖析其唯心论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哲学各个方面的表现，深挖其阶级根源和理论根源，从而摧毁其反动哲学体系。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我们对“四人帮”反动哲学，概括为六个问题进行批判。这六个题目是：

- 一、一帮权力意志徒
- 二、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反动立场
- 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恶性发作
- 四、形而上学最猖獗的表演

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猖狂进攻

六、揭穿“反经验主义为纲”的反革命实质

对于上述结构和内容的安排，有必要在这里稍加说明。“四人帮”一伙根本不配称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丝毫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没有哲学。他们是有哲学的。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这就是他们的哲学；权力决定一切，意志决定一切，这就是“四人帮”的主要哲学信条。“四人帮”是政治舞台上的赌徒，是从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位出发谈哲学的，哲学在“四人帮”手里，变成了进行政治赌博、篡党夺权的工具。我们把《一帮权力意志徒》放在第一篇，就是为了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哲学的这一反动实质及其特征。

另外，“四人帮”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次阶级斗争同以往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既有继承性，又有新的特点。“四人帮”从篡党夺权的需要出发，用极“左”的手法，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新特点，否定过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否定民主革命的经验，否定解放后十七年的经验，否定一切革命的经验，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在哲学上用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经验，为在政治上打倒既有民主革命经验、又有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唯物主

义同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这本小册子中，专门写一篇揭穿“四人帮”“反经验主义为纲”的反革命实质，揭露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方面的文章，是有必要的。这就是最后一篇所担负的任务。本书的第二、三、四、五篇是揭露“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哲学各方面的表现，这里不作说明了。

自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开始以后，我们从一些侧面写了批判“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文章。这本小册子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我们的用意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用我们的笔，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战斗，抓住“四人帮”反动哲学的本质及其体系，力求完整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搞清楚被“四人帮”搞乱了哲学理论是非，肃清“四人帮”反动世界观的流毒和影响，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垃圾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是限于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书中的缺点、不足之处，甚至错误，一定会有，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一 帮 权 力 意 志 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作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决策。这时，隐藏在党内的、时刻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个粉墨登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地表演了一番。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照出了“四人帮”丑恶的原形。随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十一年的时间是短暂的，“四人帮”只不过是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也就在这十一年中，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后的近三年间，“四人帮”是那樣的猖狂一时，不可一世，他们张开血盆大口，大有一口吞噬中国，吞噬地球，吞噬宇宙之势，比之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妄图炸平庐山之势，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于“四人帮”一切反常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所作所为又应怎样解释呢？经过揭发批判，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原来他们在政治上是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不惜孤注一掷的赌徒，他们在哲学上是一帮朝思暮想篡党夺权的权力意志徒。剖析“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反动世界观，有助于我们深入揭批他们哲学的反动本

质及其体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重要特征。任何人的行动，都离不开一定世界观的指导，“四人帮”当然也不例外。

“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根源及其特点

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四人帮”全部反革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那部分权力，从主观意志出发，为所欲为。权欲，使他们的主观意志极度膨胀；膨胀的主观意志，又驱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攫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四人帮”就是这样顽强地表现了权力意志论的反动世界观。

他们的“自我”和权欲融为一体，并在这个结合体上刷上乱七八糟的“理论”油彩，把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笼罩在灰蒙蒙的理论云雾之中。为着实现王洪文作委员长的迷梦，他们从王洪文的“自我”状态出发，拼凑了一个“流氓创业论”和“造反发家论”。居然鼓吹“历代开国皇帝，都是流氓出身”，“只有流氓出身才有办法”，“创业的人都要有霸气，还要有点邪气”。为着实现张春桥当总理的幻想和姚文元作党的总书记的盘算，他们首先是宣扬有一个“春桥思想”和“文元道路”，要树他们在“理论上的权威”；然后又宣扬“权威转化论”，说“理论上的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为着实现江青作党的主席的野心，他们编造的舆论就更是光怪陆离了，有什么“皇后继承皇位论”、“母党胜利论”、“母鸡打鸣论”。居然把形象地反映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名著《红楼梦》，说成是写母党与父党的斗

争，最后母党胜利了。又指使别人著文论述“母鸡确能打鸣”，以为这样，江青这个母鸡就自然地成了唤醒天明的神鸡了。野心是一切谎言的根源。“四人帮”正是出于权欲的需要，背离真理，编造“理论”，从而构成它的哲学体系。

权力意志论并非“四人帮”的发明，但“四人帮”的整个反革命言行表明，他们不仅是权力意志论的虔诚崇拜者，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的权力意志论有它的阶级根源和理论来源，还有它的时代的特征。

权力意志论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是权力意志论的代表人物。这种哲学把权力意志看作是世界的本质，尼采宣称：“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尼采认为，追求权力、扩张自我的本能活动，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最高价值和最高体现，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存在的和一切过程的动力，他否认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鼓吹“除了从意志到意志，根本没有别的因果联系”，认为权力意志是真理的标准，宣扬“真理的标准就在于提高权力感”，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真理”，认为“超人”应该掌权，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奴隶”、“群畜”，叫嚷：“超人”为了夺取权力，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好的，“超人”可以不遵守任何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如此等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权力意志论反动哲学，一方面是适应帝国主义的

需要；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处于腐朽、没落阶段进行垂死挣扎的理论表现。希特勒当年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发动兽性侵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鲸吞全世界，使人类屈从于他的权力淫威之下，使地球按照他的意志运行，这就是权力意志论的疯狂表演。权力意志论哲学成了他推行法西斯政策的理论基础。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权力意志论的化身和卖力的实行者，都把权力意志论捧为至宝。中国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他统治中国的时候，法西斯政治是他治国的根本，法西斯理论，权力意志论，是他治国的理论基础。

“四人帮”活动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活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披着极“左”的外衣，实际上继承了法西斯反动政治和反动哲学理论的衣钵，他们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政治、反动哲学理论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政治、反动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把反动的政治权力和反动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四人帮”所特有的权力意志论的反动世界观，具有它自己的特色。表现在：

首先，极端的权力欲。

“四人帮”的一切政治活动以权力为中心，权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权力意志论的反动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权：篡权、掌权。“四人帮”的权力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极权主义，必欲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必欲掌握党政军民学一切方面的权。其二是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所以，“四人帮”所要建立的反革命专政，既具有赤裸裸的法西斯性质，又具有鲜明的

封建性。其法西斯性质，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充分表演，人们有目共睹；其封建性表现是江青自比“则天武后”，做梦也想当女皇，妄想建立一个“朕即国家”，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法西斯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法西斯那一套要搬过来，实际上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已经对干部、对人民使用上了；封建的那一套，也要搬过来，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四人帮”要谁死，谁不得不死，也已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用上了。“四人帮”的权力所及，意志所向，那里的人民就遭殃，革命和建设就被破坏。

第二，极端的反动性。

“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极端反动性，正是“四人帮”所代表的阶级的反动性在哲学上的表现。列宁说过，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那么，“四人帮”的权力意志论，代表了哪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新生的资产阶级毒草，还有国际上的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四人帮”的阶级基础。“四人帮”的权力意志论正是这些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代表这些阶级的根本利益，反映这些阶级的意志，是这些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理论武器。

“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反动性，集中地表现在全面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社会主义敌我关系，以及他们捏造“规律”，任意炮制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他们完全不要任何

客观根据和材料，按照他们的主观意志，把“还乡团”、“复辟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大帽子戴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头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是反动至极。

第三，极端的疯狂性。

“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疯狂性，来自他们的极端权力欲和极端反动性。他们的疯狂性比起他们的老师尼采，比之希特勒、蒋介石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人帮”权力意志论的这种疯狂性，还由于在他们那里，权力和哲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和历史上权力意志论者显著不同之处。尼采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主要作用是为法西斯统治造舆论，自己并没有掌权。希特勒是疯狂的法西斯头子，他可以赤裸裸地杀人放火，却无须用什么专门哲学去吓唬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妖孽，既不是什么政治家，也够不上什么哲学家，但他们却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窃取了一部分权力，他们的一切倒行逆施也需要一种反动哲学作为精神支柱。因此，在“四人帮”身上，哲学与权力，两者是形不分，影不离，相依为命的。“四人帮”的反动哲学有了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作依靠，就更加肆无忌惮；“四人帮”的权力有了反动哲学直接为它造舆论，就更加横行霸道了。“四人帮”挥舞着“斗争哲学”的旗帜，狂叫着“对着干”的口号，充分暴露了他们权力意志论的疯狂性。

姚文元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张春桥则尤为恶毒，攻击说：“得志更猖狂”。得志便猖狂也好，得志更猖狂也好，其实正是“四人帮”自己